

《敦煌宝藏》中的彬县大佛

瓦哈浦·吐尔逊

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《敦煌宝藏》共计 140 册，洋洋大观，虽然主体仅依英国、法国、中国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影印，但是还并一并载出敦煌石窟彩塑壁画及藏经洞的绢纸画种种艺术品，还附录有一些研究成果，合为大型综合性图册。是著自 1981 至 1986 年由新文丰公司出版，于今日看来虽有图版不够清晰，一些经名修订仍有误等略感遗憾处，但其为集大成式敦煌学材料，当时即十分方便学人与各界需要。即使现在有不少印刷精美、校订更精的大型图册，如

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国内外合作出版的《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》，不过此中缺少英藏部分，特别是英藏佛经，因非佛教文献部分曾另有刊行，所以就敦煌文书材料而言，仍以《敦煌宝藏》为全，在使用仍具令人感到不可或缺之优势。

《宝藏》编著的优益之处还有不少，恕不一一具言，此就其中小有瑕疵指出一点。其图版中混入了数幅陕西彬县大佛寺的照片，与莫高窟及周围榆林窟等敦煌系统的石窟造像无关。这一点在诸多学人和有关论著中，很少有人提及，个别敦煌学重要著作还有引用，甚至在近年出版、论述颇全的彬县大佛寺的专著图册中，也没有涉及。因而撰此小文，略成指摘之言。

具体而言，《敦煌宝藏》第 112 册正文前的附图之中，就赫然印出了五幅黑白图版，均属彬县大佛寺。其“美 1828”（敦煌宝藏附图号）与“美 1829”图，是从大佛寺大佛洞（现编第 20 号）明窗部分所摄大佛胸像左右各一张 1，而



“美 1830”与“美 1831”则为大佛左胁侍观世音菩萨的正面、侧面及前室西壁龕像。美 1831 图则为罗汉洞（现编第 14 号）主室第一龕（L1）右胁侍数像。这些图版可与近年所摄略作对比，除无彩色外，构图取景质量并不差。（附图一）

读者不禁会问，这些图片既然属于大佛寺石窟，为什么跑到《敦煌宝藏》里去了？图版上所见的法文提供了一些线索。这些图上都有伯希和《敦煌石窟六》字样，如美 1828 图上有罗马数字

图版 PL.CCCLXXLL，所以此事与大名鼎鼎的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有关。伯希和 1920 至 1924 年在巴黎出版《敦煌石窟》六大册，照片都是他的摄影师夏尔·努埃特（Charles Nouette）所拍。1906 至 1909 年伯希和携测量师与摄影师组成探险团来华，在敦煌获取了大量资料。不过他们来华是由新疆入境，先在新疆停留发掘，其间 1907 年斯坦因已在敦煌骗获遗书，但伯并不知晓；伯希和于年底在乌鲁木齐时，得到因义和团事被革职发配新疆的瑞王载漪所送一卷敦煌卷子。伯希和一眼看过，便知是八世纪之前的写本。他携团于 1908 年 2 月赶到敦煌，至 5 月才离开，除了同样骗购遗书外，伯希和对石窟作了编号与笔记、努埃特拍摄大量图片。此后伯希和由内地于年底回到越南河内，1909 年 5 月再来华采购汉籍，经南京天津到北京。这时敦煌文物早由努埃特送上了大型邮轮，伯只带了一箱敦煌遗书，展示于中国学者罗振玉、蒋斧、王仁俊等人，引起轰动。至 1909

年 10 月,伯希和才回到巴黎。

彬县大佛寺图应是努埃特所摄,时间应在 1908 年 5 至 10 月间,其间他们由敦煌取道兰州、西安、郑州到达北京。大佛寺必为到西安前所摄,但是具体时间不清,且不知伯希和是否参与抑或他自己所摄³。但后来彬县大佛寺石窟图混入敦煌石窟图。事实上那些图版上还印出了“敦煌·大佛(TOUEN-HOUANG. Ta Fo-ssu)”的字样,其大佛寺即彬县大佛寺,可见原有“大佛寺”纪录,但后来大约认为大佛寺为敦煌某窟,所以混入,其后出错误的根源即在于此。

因而较早的敦煌学著作中也有此误。1956 年上海出版姜亮夫《敦煌——伟大的文化宝藏》,封面就用了这个彬县大佛寺图,即大佛洞石窟之观音菩萨照片为底饰,书中图录第 37 仍为此图(附图二)。姜亮夫先生为敦煌学界老前辈。1935 年至 37 年,曾到法国潜心研究敦煌文物,进行拍摄、拓摹、抄录,共达 3 千多张。或由法文《敦煌石窟》第六卷误导,将此数图摄回。因敦煌南北大像尺幅极大难以摄全,彬县大佛图像较完整,很有震撼力,所以采用。不过敦煌因岩质松散关系,实无这么大的石像。1999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,无论封面或内图,均无图像了。如果说此书材料所取尚早,因而较难发现其误,确可原谅的话,那在 1980 年代出版的《敦煌宝藏》、1998 年出版的彬县大佛寺图册,仍沿其误或未有提及,不免使人感到遗憾。

常青《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》所附《彬县大佛寺大事年表》,不仅提到清末丁汝昌等官吏将领修葺事、叶昌炽游览并著《彬州石室录》事,也有民国至近年对石窟的调查研考情况,似乎相当详备,但仍疏漏记此摄图之事。就照相而言,这几幅黑白图必是大佛寺最早图片。从中确可见出造像在当时的特点,如大佛面部有脱落,佛头螺发未染成紺青深色或已脱色;而大佛胁侍观音菩萨背光旁小



观音龕边(D21号)北宋宣和三年(1121)《郡守宋京游庆寿寺诗》,摹刻的字迹填写了墨色,非常清晰。更有趣的是罗汉洞之图的对比,法人所摄左胁侍四身像虽然只有天王、力士与狮子部分,但人物头部都完整。总之,伯希和的摄影师百年前来摄照片,亦为彬县大佛寺石窟史上大事,应载入史册——列进彬县大佛寺大事年表。

